

跨文化研究的基础

——走向科学的文化比较

方文

跨文化研究，或称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已日益凸现。笔者认为科学的跨文化研究首先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1. 如何审视异文化及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它构成有效合理的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预设及知识起点；2. 如何选择合理的比较尺度？它涉及到文化比较研究复杂的方法论问题。本文目的在于深入探讨这两个基本问题，从而尝试勾画科学的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及方法论基础。

一、理论预设：新文化相对论

种族中心主义是人类存在的历史事实，它的幽灵至今仍在游荡。它主张坚持对自身文化的无批判的偏向性，以及对异种文化的种种偏见，从而自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优于他人。种族中心主义导源于人类文化之间完备沟通的缺乏、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文化霸权以及反抗殖民文化霸权的民族自尊的过分膨胀。它表现在华夏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甚至人种优越论的种种变式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以之为基础的种种文化比较研究往往沦为替文化殖民或文化侵略服务的工具，从而表征出作为物种的人类自我认识的艰难及历史局限。

斯宾格勒第一次以历史哲学家的深邃眼光，从比较文化形态学的角度严厉批判了那种把近代西方当成历史事件中心的“历史托勒密体系”，并且主张用历史领域的“哥白尼体系”来替代它，以承认不同文化具有同等的优越地位^①。斯宾格勒的理智传统在20世纪初的人类学研究中逐渐赢得了实地研究的支持。19世纪人类学中流传的演化论及传播论，受到英国功能主义及美国历史主义的强劲挑战。功能主义批驳了把当代东方、原始文化看成是古代社会的残余的荒谬；历史主义则表明单线演化论及传播论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相对论”向人类学者提出了必须在文化本身的内在场合中研究文化、必须从文化主体的角度研究文化以及各民族文化各具合理性等一系列理论假设。

由斯宾格勒发轫，又经无数杰出的人类学家的努力才逐渐确立的文化相对论在人类学家比德尼那里又进行了一次新的综合。依据比德尼的理论，文化相对论可以理解为：1. 有关文化决定论以及有关文化实在的哲学；2. 一种价值评价的体系；3. 民族学及文化人类学中的研究方法论；4. 一种指向社会文化改革及变化等实践问题的态度。

（一）作为理论及哲学的文化相对论

作为一种哲学，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必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或者说个体及群体的信仰及行为准则都来自特定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体系之间的相对论又必然导致文化体系内部的文化决定论。这种文化决定论的一个自然推论就是所有文化，因而所有依文化而变的品格结构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其激进的变种可以在卡西尔的精神人类学中发现。对卡西尔来说，人生活于其自身创造的符号世界中，除却符号形式，再也没有其它的实在，因为所有的实在都是文化的或符号的^②。

而作为理论，文化相对论在 1925—1950 年间非常流行，并且曾引发广泛的争议。其最为有力的倡导者是赫斯科维茨。深受卡西尔的影响，赫氏认为物理世界通过濡化的屏幕而对个体显明，有关时间、距离、重量、大小及其它实在的知觉受任何给定的群体的习俗的调节。如果已知的所有实在都是文化实在，那么，所有的人类经验也都受文化的调节；并且，如果所有的人类经验都因濡化而结构化，自然而然的推论就是所有的文化判断，包括知觉及评价，都是给定文化系统的功能；与之相关，道德评价仅仅是文化经验中的一部分，因此道德相对论也仅仅是一般文化相对论的一个方面。

现已发展出两种类型的文化相对论：描述性的文化相对论及规范性的文化相对论，前者以罗索尔多为代表，后者则以希威德为代表。罗氏认为情感及自我（以及其它所有事情）受文化决定，而不同文化间又有显著不同，那么，情感及自我（以及其它所有事情）作为文化变异的功能依文化的改变而改变。但这些文化变异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依据其相对价值进行评价，则是个问题，罗氏及描述性的文化相对论对此都没有说清楚。依据希氏的规范性的文化相对论，不存在超文化标准来有效地评判不同文化间的不同的文化主张，也不存在评判其相对价值的方式或途径。

仔细检讨作为理论及哲学的文化相对论，就会发现其在理论和逻辑上有着致命的缺陷。第一，它有滑向种族中心论的危险。因为绝对的文化相对论与绝对的种族中心论在逻辑上是等同的。其次，文化相对论在逻辑上又必然导致文化决定论。因为承认文化之间相对论必然导致文化内部的文化独断及文化霸权。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仅仅是人类经验的一个基本条件，所有人类经验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文化调节。同等重要的是意识到实在的其它维度——人类及宇宙的自然维度的重要性，只有它们才能给人类经验提供共同的参照框架，只有在这个共同框架中才能合理地检验人类不同的文化构念（cultural constructs）。文化不是所有事物的尺度，但自然是所有事物的尺度。自然中所存在的事物，比之人类通过其文化符号所获得的更多。文化仅仅是我们人类适应自然的手段，它服务于人类生存及发展。这个超文化实在的自然前提使科学进步成为可能，并且能把我们从种种文化中心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借助对不同文化的科学的比较研究，使人类超越种种文化或种族中心的局限而生活于实在的共同世界中。

（二）价值的证实及评价

作为哲学的文化相对论的原则主张所有价值都是其文化的功能及产品，并且表征其特定文化的兴趣。因此，哲学文化相对论必然导致伦理学的道德相对论。道德相对论依据两个前提假设。第一，所有的价值判断是文化条件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是文化决定的，并且其有效性也仅仅局限于所导源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不可能建立任何被普遍

接受的准绳来评价和比较种种价值系统，因此，所有的价值系统可以认为具有同等的有效性。这种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平等的操作性假设导致把宽容作为至善。这样文化相对论者也就主张绝对的善是尊重文化价值而不是生活本身。而偏执则支持其文化价值的绝对有效性，它是种族中心的，是没有评判的偏见的结果。

文化及道德相对论在普遍道德及绝对道德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作为整体的德性在所有的文化都有其特定的道德体系的意义上，是文化普遍的；并且在所有德性体系内部，都是有一定数目的普遍价值，如真善美的标准。然而评价及界定这些价值的内容则是文化限定的。文化及道德相对论者否认存在对于所有文化绝对普遍规范即绝对道德的有效性，而可能的唯一例外是乱伦禁忌。

应该特别指出，文化或道德相对论者并不主张道德怀疑论和虚无主义。他们认为，德性是文化普遍的，并且对于任何社会的全体存在而言都是基本的。任何社会的成员都有责任去遵从其社会特定的规则及规范，没有这种遵从，社会生活就不可能。给定社会的某种行为信条一旦被接受，遵从与从众就是文化律令。在实践上，个体必须遵从其社会的规则，每个社会为了相互间的生存也必须容忍其它社会的信条。

在实际的人类学研究中，人类学家在事实实际判断中往往可以超越种族中心论，但在价值判断中往往又成为种族中心论者。文化相对论的主张忠告我们暂缓比较的价值判断，并且承认所有文化系统的平等性及同等价值。这种怀疑及暂缓判断的假想的能力，如笛卡尔所承认的，是一种把心智从过去及文化条件作用的偏见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内在的判断自由。但有些学者注意到，虽然文化相对论被用来反对种族主义，但在一些人类学家那里，则演变成为一种逆向种族主义，也就是说，它被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批评的工具，来攻击西方文化以及其所产生的西方心智。

作为道德相对论的文化相对论也不断地受到质疑。在所有文化中，个人的生命权及发展权作为绝对价值都应该受到尊重。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存在共存的文化价值的实际内核，它源于满足全人类的共同需要。文化相对论都过分地强调文化差异而忽视了其基于共同的人类属性的律令的同一性。并且通过强调文化决定论，文化相对论者全然忽视原初的不可避免的事实，即判断与文化创造的自由对于理解文化现象的存在是绝对基本的。如果人类没有内在的能力用理性及经验来评价和证实其观念的真理性，那么，以任何方式克服种族中心主义都是不可能的。果真如此，人类也会成为其自身文化条件作用的牺牲品，作为科学的人类学也不可能存在。

但我们正逐渐感受到一种希望。1993年是“世界土著人国际年”，联合国土著居民工作组1993年7月通过了《关于土著人权利的联合国宣言草案》，主要内容包括保护和民族及其文化特点；防止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行为；拥有或使用土著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利；保持传统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包括狩猎、捕鱼、放牧、采集、伐木和垦殖；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土著人问题在国际政治舞台理应受到同情和支持，世界各民族、各种族人民应当相互尊重，友好相待，为自身的生存及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的方法论基于这样的假设：人类学家能够暂时超越或者抛弃自身的文化

条件作用及价值观，把自己假想为所要研究的文化中的一员，来客观地描述给定文化；并且对于所观察的文化现象，依据其在给定文化及社会背景中的重要性及关联性来评价它。即使我们对一个部落的婚姻仪式、节日庆典、丧葬方式及成年仪式了如指掌，但我们还是不能了解作为其整合方式的文化及其在文化格式塔中的地位。给定的文化脉络或语境是种种文化现象赖以评价及解释的前提。

文化相对论作为一种科学的人类学方法论准则，要求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及移情能力。人类学家还需要从其被试角度来报告所研究的文化中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解释其数据资料，这样就常常引导研究者实地参与到他们正在研究的制度中，以便获取他们所观察到的行为的感受以及情感伴随物。因此，还必须收集民族学的陈述、故事、民俗及典型语词，因为这些文化符号凝结了所观察的文化的意识形态。

因此，虽然人类学家在收集资料及观察文化现象时是客观的，但他们还必须以其被试自居，以便领悟对象的心智及世界图景。只有这样，人类学家在评定给定文化中的人工制品、社会制品及心智制品时，才会谨慎地抛弃其民族或文化中心主义态度，——即用研究者自身的文化价值标准来评判他民族的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同样地也就会仔细考察它们与整个文化制度的关系，而不仅仅把它们置于孤立的观察时空场景中。

文化相对论作为研究方法论受到普遍的赞赏及推崇，因此也就认可了从所研究的文化参与者角度来报告及解释资料的相对客观性的合理性，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认可了局外人的观测及报告，局内人的体验及解释的合理性。

（四）实用态度和文化理念

也有必要区分文化相对论的普遍事实和文化相对论的理想价值。披览历史画卷，我们会发现文化相对论的事实和种族中心论相互并存。在一个极端教条化的文化条件作用下，人就会走到极端，认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具有绝对地位而因此诋毁其它文化价值；但在一个“启蒙”社会中，人会意识到文化相对论的事实，并且认定在比较价值判断时没有统一的准绳。因此文化相对论的事实应该唤醒文化相对论的理想，它容忍所有文化的存在。并因此可以含蓄地预设一种文化和谐，它使多元文化世界中的所有文化并存成为可能：它可以借助二次大战中残酷的事实及世界上多处发生的种族争斗，在我们当代的文化危机及文化冲突的真实图景下唤醒一种乐观的浪漫主义。

因此作为理想的文化相对论和真实的种族中心论是相互对立的。借用康德的术语，我们应该陈述一种新的文化律令：在行动中，把所有的文化都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作为对以上深入评述的总结，我们在此明确表述我们对于文化的基本态度即新文化相对论的主张，以期作为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预设及知识起点。在最为抽象的哲学层面上，我们认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自然实在作为超文化前提。在此基础上，每种文化都作为其自身的目的存在，而不能用作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我们认可人类具有内在的理性判断自由及创造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对与绝对的文化相对论相关联的文化决定论及种族中心论抱有审慎而批判的态度；同时也对当今流行的种种反中心、反基础、反传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另一种文化霸权的企图保持警惕，因为它们作为某种文化组成部分也融入我们所观照的整体文化视野中。在伦理学层面上，我们认可生命权及发展权作为绝对的道德律令；在此基础上，我们认可宽容作为至善，而反对一切形式的偏执态

度和行为。在研究方法论层面上，我们认可相对客观性的合理性，并且对于价值判断时的种族中心倾向保持敏感的反省。而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应该唤醒文化相对论的理想，它容忍多元文化的和谐并存，共同发展，并且对于土著的文化传统的保持及发展予以切实有效的同情和支持。

二、方法论规约：变量的文化等同

新文化相对论抛弃了种族中心论及文化殖民论的陈腐观念，而赋予不同文化传统以同样的存在价值及受尊重性，同时也在平等及宽容的尺度上承认种族及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因此跨文化研究的理智锁链被抛弃了，文化比较研究开始了新的时期。

跨文化研究有着不同的传统，如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及人类学，因此还没有共同认可的规范化的研究模式。在跨文化研究早期阶段，主要研究模式是用西方模式的测验来比较西方及非西方文化传统中社会心理及社会行为的差别。随着文化相对论的原则的确立，这种模式的有效性受到质疑。研究发现文化种族主义及文化偏见以及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存在于测量工具及测验情景中，并且测量工具本身就是文化制品。最近20年中，一些测验设计者声称已成功地发展了文化免疫的或文化公平的测验，但这些宣称暗示了他们没有理解文化的复杂意义^③。除却关于测量工具的文化偏见外，对测量结果的解释及判断也存有文化偏见，严重背离了文化相对论的准则。实际上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深刻反省，将其汇集在主位—客位的两难困境中予以仔细检讨。

（一）主位—客位的两难困境

主位及客位最初源于语言学的两种特定方法：音位学和语音学，前者着重于在单一的语言系统中所使用的发音，后者则着重于语言普遍的成份。涉及到跨文化研究，主位法意味着概念及工具仅仅在特定的文化中才有效，它在文化系统内部研究心理及行为，以来自单一文化的数据作为基础，使用的标准是文化限定的；而客位法则意味着概念及工具是普遍有效的，它在文化系统间作跨文化分析，所用标准一般具有文化普遍性及绝对性。

斯宾格勒指出主位方法的本质在于假定文化必须在自身的术语中才能得到理解，或者说文化系统内的成员所知觉到的行为的意义才是重要的。或者说，主位法假设了行为不是文化等同的；而客位法则假设了人类行为的泛文化的共同性。很显然，跨文化研究中所用的心理测量就是基于“客位”的假设，但后来研究者意识到使用纯粹客位的方法常常会忽视特定文化的重要信息。因此，单一文化的有效的研究与有关不确定意义的变量间的跨文化比较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主位—客位的两难困境。

（二）变量的文化等同

为了解决主位—客位的两难困境，一些研究者已经作出许多努力，提出“主位—客位综合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安迪斯在其主观文化模型中主张：1. 研究者要鉴别一种构念是否具有普遍性即客位性；2. 找出并证实可以测量这种构念的“主位”方法；3. 将经过“主位”限定的“客位”构念用于文化比较分析。具体说来，一个具体的测量工具（量具）如人格量表总是在特定的文化中制成的，即它首先是“主位”的。在文化比较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这个研究系统，如量具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等同性亦

即证明该系统是“客位”的。只有在等同的系统间才能进行有效的文化比较。如果一种研究系统在另一文化中的意义与在它的起源文化中的意义不一致，则该系统就是“伪客位”的，不能作为文化比较的基础。

伯里和戴森首先系统地界定了变量的文化等同的精确含义。他们主张在实施有意义的文化比较研究前，有三个准绳必须满足：1. 功能等同。如果能够表明两个行为与同样的问题解决有关，我们就可以说这两个行为是功能等同的。费尔德对加纳的乡村心理症及神经症的研究表明：在加纳访问牧师的神殿与在欧洲及美国访问心理医生有非常密切的相似。在这种情形下，加纳的“你有规律地访问你的神殿吗？”在功能上就等同于加州的“你有自己的心理分析家吗？”文化比较中的功能等同对于用作跨文化研究的量具如人格量表的项目编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 概念等同。它意味着文化比较中的概念虽建构在不同文化中，但必须意义相同。为了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仔细研究术语的内涵及外延从而建立共同性。这在人格问卷或量表的翻译时非常重要。涉及到人格测量时，如果原本与倒译本是一样的，那么概念上的混淆就不存在。3. 公制等同。合适的跨文化研究必须要求公制等同，或者说项目的等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通常的方法是进行项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如果发现在同样的抽样误差内，某些项目行为类似，那么这些项目就是合适的。它还可以扩展到比较诸多变量之间的相关及因素负荷，而仅仅采用这样的量表，其负荷模式及相关系数并不改变。当代许多第一流的跨文化心理学家在其实证研究中已经开始谨慎地从测量量表的设计及选择、以及测量数据的分析诸多环节上考虑这些问题。

三、结语

尽管跨文化研究已经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项目，我们还应清晰地意识到其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应该重新梳理其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及教训，重新审视跨文化研究中的理论预设及方法论规约，以确立新的知识起点及操作原则。跨文化研究者应当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文化偏见、种族中心主义及文化殖民意识侵入研究过程每一环节的危险性；意识到选择比较尺度时的变量的文化等同原则的重要性。科学的文化比较要求研究者能以一种开放、民主及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其它文化传统中的价值与理想，同样也需要非中心文化背景中的学者的自尊及勇气，积极参与国际学界平等的对话及发展。

在现有知识状态下，没有一个单一的学科能够完善解释多元社会中所有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经验及社会问题的所有成分。跨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在新的理论预设及方法论规约的基础上，携手合作，抛却门户之见，通过扎实辛勤的工作推进研究进程，并且在界定种族群体及种族文化时不乱贴标签，对种种特定情况中个体本身的文化认同及种族认同予以敏锐而宽容的注意。

①斯宾格勒：《西方的沦落》上卷，商务印书馆版，第34页。②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33页。③陈卫旗：《民族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载吴江霖主编《民族社会心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版，第22页。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邮编：100871〕

【本文责任编辑：薛勤 江树革】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NO. 1, 1996

On the Foundations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

by Fang wen

Two fundamental issues should be redefined would Cross-cultural Studies be further pursued. The first is the issues of how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ther cultures and our own; the second is the issues of how to choose the variables by which we can validly compare cultures. Reviewing the recent studi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forthcoming Cross-cultural Studies should depart from Neo-cultural relativism, with the cultural equivalence of variables as a new methodological rule.

Northeast Asia's New order and Korea Peninsula

by Piao chenghao

Korean Peninsula occupies a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place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It affects not only the security of both North and South Korea, but also the securities and interests of all nations in region. Therefore, the issue of Korean Peninsula, whether now or in the future always is the basi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mong n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as well a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establishing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subregi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issue of Korean Peninsula would help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 Northeast Asia, and vice versa. To this end, both sides on the Peninsula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should,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onsultation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seek the stability of Korean Peninsula, then push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Peninsula forward, and, on the basis of steady settlement of the Korean issue, bring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 Northeast Asia.

The System of High Rank Local Officia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

by Wu Ji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y locality both exercise Province, Prefecture and county grade - 3 government system. Dao is higher than Prefecture, and lower than Bu and An two departments, seeming it is one grade government. Actually this is not so. The Dao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locality is divided into Shou Dao and Xun Dao. They are respectively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Cheng Xuan bu Zheng Shi department and Ti xing An Cha Shi department, as an agency of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department. Besides, they have both at the same time function of supervising prefecture and County, dominating or being put in charge of prefecture and county of the whole province, residing in one Place or Provincial Capital. They are popularly named "Supervising Department" together with Bu and An two department. The system of shou Dao and Xun Dao is an important system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monarch highly centralization of state power, Perfecting provincial regime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locality administration. this system have important supervising function to Ming and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to Qing locality administration, and an also important contents of study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locality Polity system.

Science Makes Boundless Contributions

by Sun Yu

A research into Lu Xu's collection of natural science books brought u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is collection is, apart from literature, his spiritual compensation, a basic factor that changed Lu Xu's way of thinking and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his bas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His thoughts of nature science were thus formed and became an organic part of his mental world.